

【编者按】2013年6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应邀到南京农业大学作题为《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学术报告。蔡昉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曾兼任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次报告是经济管理学院名家讲坛系列讲座之一。

蔡昉教授的精彩学术报告获得了广大师生的热烈反响。为了帮助听众和广大读者全面理解蔡昉教授的学术见解，也为了促进在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领域的讨论，主办方征得蔡昉教授同意，根据报告录音整理了一份记录稿，经作者本人校订、增补后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

十分感谢蔡教授对南京农业大学和本刊的支持!

通过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潜在增长率自然下降, 实际增长速度也开始降低, 许多国家因而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但是,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并不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是必须能够正确认识发展阶段, 靠挖掘改革红利提供生产率而不是依赖拉动需求的方法来刺激经济。要提供全要素生产率就要鼓励竞争, 鼓励优化资源配置, 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 提高人力资本。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红利 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配置 人力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目前我国人均 GDP 超过 6000 美元, 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但同时我国经济也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即已越过刘易斯转折点,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从 2012 年经济增长出现减速。正如世界银行等组织提醒的那样, 很多国家在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后, 经济没能保持继续增长, 最终没能实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因此, 目前各界人士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关注与讨论很多, 本文将从理论与经验的角度对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行阐述。

一、经济发展阶段划分

1. 低收入阶段

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 这一阶段人口呈几何指数增长, 食物呈自然指数增长, 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人均食物拥有量维持在生存水平, 人口下降, 恶性循环不断加剧, 经济维持在低收入水平阶段, 不断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处在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之中。经济学家琼斯(Jones, 1999)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描述。如果把人类迄今为止的 100 万年历史设想成一个 100 码长的橄榄球场, 从起点到终点, 农业诞生使人类得以揖别单纯靠采集和渔猎生存的生产方式, 即大约 1 万年前的时候, 球场已经走过了 99 码; 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距离球场终点只有 7 英寸; 而使英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脱离马尔萨斯陷阱的工业革命, 则已经距球场的终点不到 1 英寸了。

2. 中等收入阶段

一旦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许多国家开始重视经济发展, 进行体制改革, 不断提高资本积累率, 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跨越了低收入阶段, 进入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存在两个部门, 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门, 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劳动边际生产力非常低

下;另一个部门即非农产业部门,该部门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又由于社会剩余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该部门在很长时间内可以依靠固定的制度性工资从第一部门吸收大量劳动力。这一时期称之为二元发展阶段,也称刘易斯发展阶段。随着非农产业的不断发展,剩余劳动力大量从第一产业转移¹出来,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其供给,此时人口增长也发生转变,从过去的快速增长转变为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放缓,随后劳动年龄人口趋于负增长,因此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通劳动力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一现象也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这一转折点之后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 高收入阶段

一个经济体经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一般来说因进入人口转变的新阶段,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以往支撑经济增长的源泉,即劳动力增长、资本形成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都逐渐趋于减弱,最终经济增长进入新古典阶段。这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是,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报酬递减,因此,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不再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只能依靠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否则经济将会出现停滞,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索罗”阶段。

综上所述,人类的发展可以分为马尔萨斯发展阶段、刘易斯发展阶段和索罗阶段。以出现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现象为标志,我国于2004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以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即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拐点,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消失。因此,我国面临着如何跨越到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难题,如果不能成功跨越,将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努力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研究数据表明,1820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1/3,人均GDP也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但在鸦片战争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对速度迅速下降,1950年GDP总量和人均GDP占世界的比重均降至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后全世界也出现了经济大分流,欧洲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其他国家依旧保持贫困落后的局面。上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又出现了大趋同的趋势,但由于我国相关政策的失误,错失了这次发展浪潮,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在2003年以后,我国人均GDP占世界的比重实现了快速增长,现已超越我国历史上最高水平。党的十八大也因此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即2020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2050年的现代化目标。

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曾说过,如果让300年后的经济学家书写今天的历史,他们可以不记得9·11和冷战结束,但一定会记得中国的崛起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我国过去30余年GDP保持了10%的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为8%左右。根据统计学的“72法则”,如果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7%,那么10年就可以翻一番;如果保持10%的增长率,7年就可以翻一番。因此,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里考察经济增长,比如一个人的预期寿命70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叶,那么无论是7%还是10%的经济增长率,中国人可以在其一生中体验到100多倍的生活水平改善。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一个是到2020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另一个是到2050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经济以7%的速度,从改革开放开始持续增长7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50000美元,如果保持10%的增长率,人均GDP将达到300000美元。当然,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影响,经济不会一直保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但我们依然可以推测,从改革开放到实现

¹收稿日期:2013-8-23

作者简介:蔡昉,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三农”问题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百年目标, 人均生活水平将会有近百倍的提高, 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早期西方国家是发展最早的国家, 但他们的发展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美国曾实现年均 3% 的经济增长, 日本最高时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九点多, 亚洲四小龙增长速度一度更高, 但他们要么增长速度不如中国这么快, 要么未能维持很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也仅仅是明显改善, 而真正能做到改善 100 多倍的估计只有中国。随着中国跨越刘易斯转折点, 人口红利消失,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将会越来越困难, 而离本世纪中叶还有很长的时间, 今后的发展之路将会充满荆棘, 这也意味着我国已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 抑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

二、“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原因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 中等收入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国家总要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才能跨越到高收入阶段, 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则需要四个步骤, 他们在时间上是继起的, 空间上可以是并存的, 我把这四个步骤简称为“四部曲”, 完成这“四部曲”之后就真正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

1. 经济增长减速

2012 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减速, 2013 年仍然在减速, 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将常态化, 这也是一个自然现象。有关经济学家研究发现, 当人均 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 7000 美元到 17000 美元之间, 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下降, 比如当人均 GDP 达到 17000 美元时, 高速增长经济将出现的降幅大约为年均 GDP 增长率减少 2 个百分点 (Eichengreen, et al., 2011), 而我国人均 GDP 正好在 7000 至 17000 美元之间, 正处于减速阶段。当然, 经济减速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

从人口的角度看, 2010 年以前我国劳动人口 (即 15 至 59 岁之间的人口) 一直持续增加, 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 劳动力供给充足, 人口负担较轻, 经济增长的剩余不断积累, 实现了高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 这也称之为人口红利。当然, 人口红利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此, 它还贯穿于整个经济增长之中。

在过去 30 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 资本的贡献最大, 占 70%。资本积累虽然体现为物质资本的积累, 但也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首先, 较低的人口抚养比为高储蓄、高积累、高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这才促进了资本的不断积累; 其次, 由于劳动力供应充足, 打破了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假设, 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出现, 资本投入不断得到回报, 经济也才能不断高速发展, 这也是人口红利的一种体现; 第三, 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抚养比, 以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Cai and Zhao, 2012)。分析发现, 我国整体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的作用, 而现今我国人口结构和变化趋势都发生了改变, 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将相应改变, 经济增长减速也就是情理之中。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0 年开始将出现负增长, 2012 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345 万人, 抚养比开始上升, 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也将受到影响, 甚至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我们可以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进行解释。潜在增长率, 就是指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劳动等的供给能力, 以及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如果这些能力很强就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 如果这些能力出现弱化, 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过去我国生产要素的供给与生产率的提高都与人口红利有关, 现今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潜在增长率也就出现下降趋势。

如图 1 所示,“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下降到 7.2% 左右,“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有可能降到 6.1% 左右。这是一个自然的减速过程,而非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去年我国经济出现减速,众多分析人士都指出是由于西方在金融危机之后复苏乏力,加上欧债危机的影响,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下降,出口减少从而减缓了经济增长。但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决定因素是潜在增长率。根据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去年我国潜在增长率本应下降,而去年的经济放缓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判断经济发展形势,避免做出错误的举措,从而把经济减速这一正常现象变为不正常的经济长期停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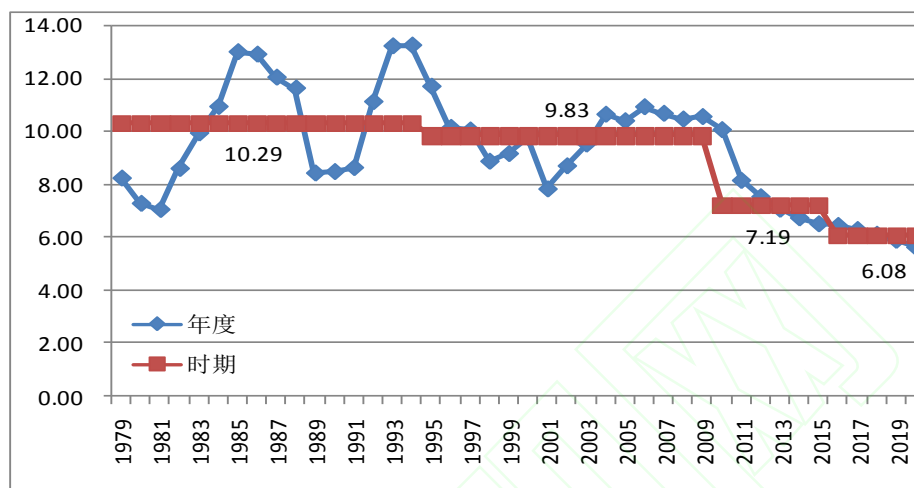


图 1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增长减速

资料来源: Cai Fang and Lu Yang, Population Change and Resulting Slowdown in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3, 21 (2) : 1-14.

2. 经济增长停滞

经济增长出现减速后,政府自然想到刺激经济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期望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开发等方面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借助区域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加以推动。但这些政策都是刺激性政策,刺激的都是需求方因素;而如上文分析所述,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供给方的能力。因此刺激需求的政策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南辕北辙,甚至往往会造成问题的恶化。

在经济发展中,如果人为地将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不仅会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泡沫经济等问题,还会扭曲生产要素价格、背离比较优势、保护落后企业,从而造就一大批“僵尸企业”或者“僵尸产业”。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假设刘翔的生产要素是人类的生理极限,他的生产率由他的训练水平、团队的科学规划决定,其潜在增长率由此而决定。刘翔可以提高运动成绩,但是受限于自身禀赋和训练情况,即他的潜在增长率是确定的。然而,在现实中,主管部门、各类广告商以及大众的期望,制造了一种需求因素,试图让刘翔达到一个超越潜在能力的实际增长速度,最终的结果就是刘翔频繁受伤。

再以日本经济发展的为例,在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时候,日本经济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实现了每年 9.2% 的增长速度。上世纪 70 年代初,日本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到了低点,并且保持了近 20 年的低水平,这期间人口红利开始减弱,但没有彻底消失,日本的增长速度降到了每年 3.8%。到了 90 年代以后,日本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速度降为每年 0.85%,并且持续了 20 年,是为日本“失去的 20 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日本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措施,即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因而潜在增长率逐渐下降时,日本人

均收入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此时本应该像其他处在新古典增长的国家一样,依靠技术进步、创新、人力资本的提高来提高潜在增长率。

然而,日本却错误地认为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停滞的主要问题。由于外需无法控制,内需处于饱和,日本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拉动投资需求。因此,日本实施了诸如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内的刺激性方案。这些方案最终带来的不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大量泡沫的形成。到了80年代末泡沫破裂,大量企业濒临倒闭,而那些被政府救助下来的企业成了“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又将银行拖累成“僵尸银行”,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停滞了20余年。时至今日,日本当局仍然认为需求不足是其经济问题,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对经济长期增长的效果将有限。

3. 社会问题涌现

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三阶段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大批社会问题的涌现。学者甘洋曾提出中国如果成为高收入国家,将耗竭全世界的资源,他认为中国应该停在中等收入阶段,在此阶段我们要做好收入分配工作,缩小收入差距(余永定主编,2011年,第43页)。但是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停滞的时候能够改善收入分配。以前中等收入陷阱又称为拉美陷阱。在80年代以前和80年代到现在这两段时间内,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都高于0.4的警戒线。也就是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必然有较高的基尼系数,无一例外。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问题涌现,最终影响政治稳定。

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也处于较高水平。由于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保持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蛋糕”不断做大,虽然存在分配不公的现象,但大部分人的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仍能保持稳定。但是,如果在中等收入阶段上经济出现停滞,“蛋糕”不再做大,人们将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收入分配上。特权阶层自然能分到较大的“蛋糕”份额,而那些分不到合适份额的阶层,收入水平将会绝对恶化,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社会问题不断涌现。

4. 体制固化

收入差距是由收入分配不公所致,而收入不公是由人们的权利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均等决定的。因此,从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看,占有最大的社会资源份额的群体,终将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尝试将经济和社会体制固化和僵化,尽一切可能阻挠改革,最终导致政治的腐败。有些国家认为选举带来的执政能够提高老百姓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但是由于“蛋糕”不再能够做大,既得利益格局也难以打破,竞选政治家们的所有承诺将难以兑现,这些国家政策因此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里。

三、避免“陷阱”的政策选择

从经济学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超稳定的均衡状态,一旦落入很难自拔。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多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阿根廷在20世纪30年代时是一个比美国发达的国家,但其现今人均收入水平只相当于美国一个微小的份额。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必须采取如下几个措施。

1. 准确判断经济增长阶段

目前,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完成。这里的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二元经济消失的“商业化点”,而是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第一个

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发生在 2004 年。即使认为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区间,那么 2010 年时,刘易斯转折点也已经结束。因为到 2010 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绝对减少,而不再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快于劳动力供给这个相对问题了。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才提出,在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改革挖掘制度红利。

2. 改革挖掘制度红利

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在哪里。经济增长来自以下几个方面: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抚养比的下降、资源配置的改进和技术进步。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加和抚养比的下降。转折点之后,资本积累的贡献会自然下降,劳动力增长的贡献将变成零,抚养比的贡献会先下降,直到零甚至为负。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人力资本、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所有这些要素都只能通过改革才能获得。

2011—2020 年,潜在增长率会很自然地不断下降。我们不希望用拉动需求的办法去刺激增长,人为地将增长率拉到潜在增长率以上;但是可以并且应当提高潜在增长率。虽然目前劳动力的供给呈现负增长,但是我们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以增加劳动供给²。我们曾模拟过,如果在 2011—2020 年期间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这期间潜在增长率每年可以提高 0.88 个百分点(Cai and Lu, 2013)。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未来人们将会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里,20 岁之前的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上学,这一部分人群不属于就业。西方国家普遍应用的是把退休年龄后延,我国也可以借鉴此办法。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好的是现在 20 岁左右的群体,59 岁退休年龄的人群其受教育程度还不到小学水平。即使企业缺工,也不会需要这些大龄劳动力,因此人为延长退休年龄只会造成这部分群体失业。

目前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比较低。原因在于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挣钱、居住,但由于社会保障等因素的缺失,他们无法形成长期预期,一旦经济不景气,他们将会返乡。事实上,农民工每年春节后都会重新做一次“是否进城打工”的决策。虽然年轻人必然选择进城打工,但年龄大于 40 岁的农民工,由于家庭等问题很有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能把农民工变成市民,劳动参与率将会明显提高。我国 53% 的城市化率中有 1.6 亿的农民工,但这些农民工并不能拥有与城市人一样的基本社会保障。我国的城市化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化,因为计算城市化率时把农民工群体加进去为 53%,把农民工去除,按照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算则只有 35%,其中还有很大的差距。农民工由于户口等问题,在城市中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就难以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一石三鸟”,立竿见影。首先,农民工成为市民后,会形成稳定的预期,其接受教育、培训的热情也将提高,劳动供给增加,劳动参与率提高,潜在增长率增加。其次,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减缓目前企业工资的快速上涨压力,同时也能起到让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的作用,在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为企业转型升级赢得时间。第三,农民工市民化后,社会保障到位,解决了后顾之忧,消费热情上涨,因此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消费的需求。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哪些方法?到目前为止,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资源的重新配置,例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资源的重新配置对中国过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接近 50%;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其贡献将会降低。但是在一个产业内部,例如第二产业内部,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仍然存在,并

² 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

且一个行业内的不同企业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距。企业生产率的千差万别表明要素流动不充分, 竞争不充分。效率高的企业并没有取代效率低的企业, 是一种无效率的表现。所以应当允许企业充分竞争, 允许企业退出和进入, 允许有能力的企业把低能力的企业“吃掉”。

如果能够做到上述这些, 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大幅度提高, 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也会大幅度下降。一项研究表明, 在美国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于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 (Foster et al., 2008)。与之相比, 另一项研究表明, 中国的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过大, 如果能够将之缩小到美国的水平,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 (Hsieh, et al., 2009)。鉴于这两项研究, 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程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我们还没有得到; 而如果要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 要让企业充分竞争, 就必须改革。

中国在技术上与发达的经济体还有很大差距, 这个差距也带来了后发优势。当前, 如果过度强调或者扭曲创新的含义, 中国可能会牺牲掉本来应该有的后发优势。我们一直在强调创新, 声称中国必须抓住正在到来的第三次科技浪潮。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抓住, 反倒是改革带给了我们良好的发展。第三次浪潮有其崭新的特点, 但是没有改变创新的机制, 那就是靠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来实现。创新是把现实中能够提高的, 使得不能提高的退出竞争舞台, 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人, 我们不能实行创造性破坏, 因此才有社会保障制度, 而对企业, 只有实现创造性破坏才能实现创新。

3. 发展教育和培训

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普遍批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太快、扩张太急, 希望能够放缓高等教育的扩张速度。政府事实上也是在这样做。这是没有道理的。实际的问题不是教育过度, 而是教育没有能够转化成创业和就业技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用“求人倍率”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该指标将劳动力市场上招工单位的岗位数当分子, 把求职的人数当分母, 如果求人倍率在1以上, 说明岗位数量多于劳动力数量, 劳动力需求很可能没有得到满足, 反之亦然。从受教育的程度看,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沿着初中、高中、技校上升, 到了大专、本科开始下降, 市场对大专和本科学的需求甚至低于中学生。看似我国的产业结构对高学历需求不大。其实不然, 如果按照技术职务、职业资格进行考察, 需求量最高的还是那些技术职务最高、职业资格最高的人。也就是说, 原本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和人力资本有最高的需求, 但是受教育程度和学历并没有变成劳动力市场上的技能和人力资本。这中间有学生的问题、学校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来自教育部门。

再者, 我们把中国各个行业大学生的比重与美国作对比。首先, 我们发现中国的全部劳动就业人口中, 大学生比重是10%, 而美国是40%。其次, 我国大学生就业领域非常狭隘, 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教育卫生、信息业和金融业, 其他行业比重极低。美国在那些行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也较高, 但是低于中国, 而在农业、制造业、交通业、商业贸易、餐饮旅游等行业中的大学生比重远远高于中国的大学生(图2)。当然, 中国的农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目前还没有升级到需要更好的人力资本。而不久的将来, 这些行业终究要实现升级换代, 创造出需要很多人力资本的岗位来。在这些岗位被创造出来的过程中, 高校毕业生也应当转变观念, 把生产一线当作大有可为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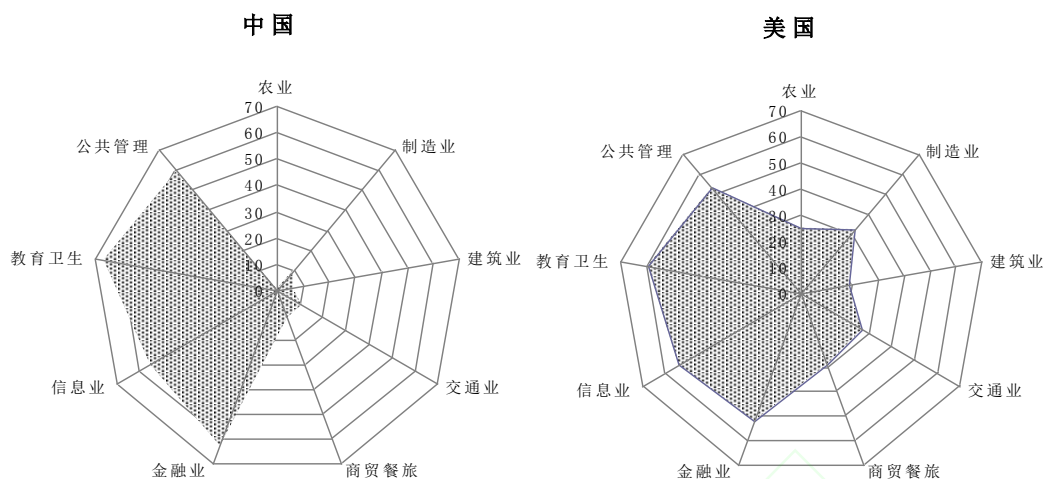


图2 中美相关行业就业者中大专以上学历比重

资料来源: 胡瑞文等《我国教育结构与人才供求状况》, 课题报告, 2013年。

归根结底, 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 产业升级和创新仍然表现在物质生产的领域, 并不仅仅表现在高端的第三产业中。因此, 如果大学生不去这些物质生产领域, 或这些物质生产领域不能够产生对更高人力资本的需求, 人力资本无法转变成生产力, 将很难实现未来的经济增长。

从农民工角度来看, 现在面临着一个威胁。自2004年以来, 农民工出现短缺, 工资上涨, 对农民工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对于农村的中学毕业生, 家庭会替他做一个决策, 如果继续读高中, 家庭将每年损失三万元以上的机会成本, 因为高中不再是义务教育阶段, 还将支付一笔较大的直接费用; 高中毕业能否进入大学并不确定, 即使能够进入大学, 最终不仅再损失四年工作的机会成本, 还要付出四年的直接费用, 并且面临着就业压力。当农村孩子找到工作, 发现起薪还不如农民工。因此在当前, 农村中学毕业生不读高中, 甚至初中辍学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我国目前农民工分年龄段的教育年限最好的是9年多, 他们适合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未来中国经济会减速, 产业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因此对第二产业资本密集型岗位的需求会增加, 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将接近11年, 我国农民工目前受教育最好年龄段的群体也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更进一步, 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 第三产业中技术密集型的岗位需求也随之增加, 农民工更无法胜任。因此, 目前我们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大众的受教育程度。如上所述, 一个家庭从理性出发, 除非有很好的家庭条件, 一般不会选择让孩子读书, 这就是“市场失灵”。政府真正应当做的是在市场失灵时发挥作用, 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阶段。

一些研究数据显示 (Godo, 2011), 日本在人力资源培育方面曾犯过一个历史性错误。日本也经历过高校扩招和大学生就业难, 大学生工资下降, 甚至教育质量下降。日本社会就像中国舆论一样批评政府, 迫使文部省最后有意放缓了高等教育的速度, 使得日本的高校水平在80年代后期和美国的差距逐渐拉大。在整个教育上, 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 日本和美国的水平都越来越贴近, 唯独高等教育的差距愈来愈大。高等教育差距拉大的结果与日本失去

的20年不无关系,人们对此提出一个假设——日本的经济没有了创新能力。所以中国应当未雨绸缪,尽可能地保持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

要保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需经历三个步骤:第一,在短期内依靠工资上涨。只有工资上涨,企业才能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承受得起,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休克疗法让本来有转型空间的企业被过快增加的压力所压垮。第二,在中期内劳动力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靠接受培训,特别是在职培训。目前情况下,农民工不会在城市长期生活,雇佣关系不稳定,工资不停地变化,农民工不断地跳槽,降低了接受培训的兴趣,企业也不愿为之支付培训费用。这时候迫切需要建立一种稳定的雇佣关系,归根结底,要靠户籍制度改革。第三,在长期,靠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的发展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过去的3次人口普查发现,尽管过去的20年我们经历了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校扩招等教育发展最快的年份,但是,每10年我国成年人的受教育年限才提高1.2~1.3年,而产业升级将对受教育年限提出的要求至少是3~4年。因此未来必须继续大力发展教育。

四、结论

因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减速时最重要的是不犯错误,不让增长的减速变成长期的停滞。我们还要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经济减速共存的问题。尽管现在的现象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在陷阱中,但是要解决众多与陷阱相关的现象,例如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失衡问题、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改革停滞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够处理好,那么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就会很遥远,还会渐行渐远。照此发展,到了2020年或者之后,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2000美元以上,也就初步地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

参考文献

- Cai Fang, Lu Yang. Population Change and Resulting Slowdown in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China[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3, 21(2):1-14.
- Cai Fang, Zhao Wen.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 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M]// Masahiko Aoki, Wu Jinglian. *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Eichengreen Barry, Donghyun Park, Kwanho Shin.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R]. *NBER Working Paper* 2011: 16919.
- Foster Lucia, John Haltiwanger, Chad Syverson. 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 Selection on Productivity or Profitabi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394-425.
- Godo Yoshihisa. Estimation of Average Years of Schooling for Japa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B/OL]. 2011. <http://ideas.repec.org/p/hit/primdp/9.html>
- Hsieh Chang-Tai, Klenow Peter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4): 1403-1448.
- Jones Charles. Was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evitable: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Very Long Run[R]. *NBER Working Paper*, 1999:7375.
- 余永定.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挑战与未来[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43.

(责任编辑 宋雪飞)

Avoid “middle income trap” through reform

Cai Fa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After reaching middle income stage, the potential rate of growth will inevitably decline a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s have disappeared. Many countries have fallen down into so-called “middle income trap” as their growth stagnated. However, reaching middle income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falling down into “middle income trap”. The government must be able to correctly identify the development stage, to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further reform in order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instead of expansion of demand. Promotion of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rough competition, as well a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e basic measures to increa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words: “middle income trap” demographic dividend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resource allocation human capital